

# 观水有术,必观其澜

——读《清代今文经学新论》

杨世文

(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,成都 610064)

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,经学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,对经学的研究著作也汗牛充栋,指不胜数。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“国学热”,将经学研究推向学术前沿。对清代经学的研究,发表的论文、出版的专著已经不少,但是,真正能够超越前贤、提出新见的著作其实并不多见。清代经学,除乾嘉朴学之外,今文经学则为大宗,占据清代学术的半壁江山。尤其是晚清今文经学,由于其与古今中西之争、变法维新之政、尊孔反孔之教相纠葛,更突显出其学术思想史意义。最近出版的著名经学史研究专家黄开国教授主编的《清代今文经学新论》(以下简称《新论》)一书,努力揭示清代今文经学的文化学术意义、时代特质及具体表现,是一部研究清代今文经学的最新成果,该书在很多重要问题上力破成说,通过深入细致的梳理,提出对清代今文经学的新解释,代表了清代今文经学研究的新高度。

清代今文经学是整个清学的组成部分。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解释,可谓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王国维在《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》中提出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影响颇大的“清学三阶段论”——“国初之学大,乾嘉之学精,道咸以降之学新”。章太炎撰有《清儒》一篇,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变迁作了提要钩玄式的概括。刘师培著《近儒学术统系论》、《清儒得失论》、《近代汉学变迁论》,对清代学术作了富有价值的总结。1904年,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上发表《近世之

学术》一文,认为:“有清一代之学术,大抵述而不作,学而不思,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。”后来他著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对清学的评价有所变化,在自序中,把清代考据学与先秦子学、两汉经学、隋唐佛学、宋明理学、清代朴学并称为我国五大学术思潮。梁氏还提出,清学之出发点,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。他的这一论断,影响深远,响应者众。随后钱穆著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,在序言中明确地提出:“近代学者每分汉、宋疆域,不知宋学,则亦不能知汉学,更无以平汉、宋之是非。”他针对梁启超的“宋学反动”说,强调宋明学术在清代的延续性和继承性。后来钱穆的学生余英时教授又加以发展,提出“内在理路”说来解释宋、清学术的联系。梁、钱等人重点讨论清代学术的缘起,尤其是清代考据学为什么会兴盛。他们把清学作为一个整体,着眼于清学与宋明学术之间的关系。这样的讨论,在面对历史的细节时,其有效性无疑将大打折扣。如关于清代今文学的兴起如何解释,仅仅着眼于汉学、宋学,就会捉襟见肘。

《新论》一书,将清代今文经学放在整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,重视中国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。作者认为,作为经学结束的清代今文经学,绝不是汉代今文经学的简单回复,而是蕴含了汉代以来整个经学发展的内涵。所以,对清代今文经学的讨论,绝不仅仅只是清代今文经学的研究,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到整个中国经学发展史的宏大课题。只有站在把握整个中国经学史发展的历史高度,才能高屋建瓴地对清代今文经学作出公正的评

收稿日期:2017-09-24

作者简介:杨世文(1965—),重庆潼南人,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,博士、博导,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、学术史研究。

说。清代经学与以往经学的最大不同在于,从宋明经学的重视“四书”之学变为以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为中心的朴学。作者指出,这是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来经学发展的必然结果。作者尤其重视研究的方法论,强调对清代经学的准确认识,必须从整个经学发展史来把握,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清代经学本身来讨论;如果仅仅从清代经学来说明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,难以对晚清的今文经学作出合理的全面说明。

断代经学史研究,离不开对整个中国经学史的宏观把握,否则难免盲人摸象,难免片面。《新论》一书讨论聚焦于清代今文经学,但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,对经学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论性问题做了独特的阐发。如关于经学史的分期与分派问题,涉及到整个中国经学史的定位。这个问题不解决,对清代今文经学就难以做出准确的把握。因此,针对学界关于经学史分期、分派的争论,作者提出具有理论价值的思考,认为经学的分期、分派不应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。就经学发展而论,一个时期的经学必有相应的特征,这个特征既是经学分期的依据,也是经学分派成立的根据,所以分期与分派应该是统一的。作者将中国经学分为三个时期,同样也应分为三派。从汉到唐为第一期,是以训释五经为主的学派(外王);宋元明为第二期,是以训释四书为主的学派(内圣);清代为第三期,是以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为据的学派(文字训诂)。作者认为这三期或三派的变化,也就是经学发展过程的演变。正因为作者能够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来评说清代今文经学,故整个研究给人耳目一新、新义迭出之感。此说的提出,对经学史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。

## 一

如何从文献、历史与逻辑出发,精准把握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理路、阶段与特点,是《新论》着力较多的重点所在。这也是本书最大的创新之处。

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《新理学》“绪论”开篇提出“接着讲”和“照着讲”两种治学方法:“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,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。我们说‘大体上’,因为在许多点,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,大不相同之处。我们说‘承接’,因为我们是‘接著’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,而不是‘照著’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。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。”简单理解,“照着讲”着眼于继承,“接着讲”

立足于创新。《新论》对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阶段提出全新的、具有创造性的见解,纠正了前人似是而非之说。作者把清代今文经学发展分为两大阶段,指出其最大的不同在于“照着说”与“接着说”的差别,也就是作、述之别,“照着说”是述,“接着说”是作。在此认识的基础上,作者对清代今文经学各个时期的理论特征做了科学的定位,认为“照着讲”阶段是对西汉今文经学的理论复兴,所讲的今文经学在理论上基本上是汉代今文经学的再现,还没有与时代相结合的新理论。当然,“照着讲”也不是铁板一块,其中还可以分为三个小阶段:即开创期、复归期、扩展期。尽管有三个小阶段的变化,但其中有共同不变的东西。如在治学方法上,所采用的主要是清代朴学惠氏吴派重家法的治经方法;在经学内容上,他们讲的今文经学,都是按照汉代的今文经学的师法原则,力图去恢复其原貌;就精神实质而言,还只是一种与现实政治没有直接联系的理论,只是从书本发明西汉的今文经学,缺乏西汉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真精神,只可以称之为一种学问,属于从书本到书本的纯学术研究。而宋翔凤、龚自珍、魏源的今文经学,介于“照着讲”与“接着讲”之间,具有承先启后的独特意义。“接着讲”的阶段以廖平、康有为为代表,他们的今文经学与龚、魏以前的清代今文经学相比较,已经不是梁启超说的复西汉今文经学之古的“照着讲”,而是“接着讲”,即利用公羊学的孔子改制说的理论形式,来发挥其与时代相结合的新理论,具有融合古今中西的时代特点,以近代的现实社会为关照,实际上已经是具有近代文化特色的历史转型意义。

任何学术的发展演变都不是孤立的,因此史学大师蒙文通先生曾提出“事不孤起,必有其邻”,“观水有术,必观其澜”的治史原则。清代今文经学错综复杂,著作纷繁,学者众多,他们的学术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,既有继承又有扬弃。如何从中总结出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规律,对其学术异同做出合理的阐释,不仅体现了一个研究者的历史敏感度和研究水平,也关系到研究工作是否成功,研究成果是否有价值。《新论》作者提出的以“照着讲”和“接着讲”来划分清代今文经学的阶段和派别,是一个独创。用这样的眼光来观照清代今文经学发展,再经过作者的细致疏理,清代今文经学演变的内在理路、逻辑线索、历史进程,就昭然若揭了。这对重新认识清代

今文经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价值。

### 三

学术研究如果只从宏观上着眼,难免流于空疏;如果过于微观,则会有琐碎之病。优秀的学术著作,会很好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。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有机结合,是《新论》的一大鲜明特色。

作者纵论晚清今文经学“接着说”出现的根本原因,不仅仅是对清学的反动,而且是整个君主专制制度行将灭亡,新的社会阶层要求改变旧的社会制度,并朦胧地呼唤新的社会制度的双重体现,它是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在文化上的反映。这样的判断,无疑比单纯强调所谓“复古求解放”,无疑更有说服力。作者通过对清代今文经学的深入研究,对相关经学家的今文经学思想做了比较准确的把握、详细的论说和公允的评价,并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新的看法。如前人都认为庄存与重视微言大义,而《新论》在区分微言、大义的基础上,以坚实的证据,指出庄存与只重视大义,并不重视微言,并以“全至尊、立人纪”来概括庄存与重大义的主要内容,同时肯定庄存与重春秋公羊学的开风气的历史意义。又如传统观点认为龚自珍、魏源以今文经学议政,但该成果通过对龚自珍全部论著的认真研究,认定龚自珍的经学虽然有今文经学的成分,但大多不属于今文经学;龚自珍、魏源的经学著作没有以经议政的内容,他们以经议政的著作都不是今文经学的著作。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来源,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和争论较大的问题。近年有学者提出,康有为在光绪十二年(1886)所著的《教学通义》中,就已经有了今文经学的观念。这个观点在学界流传很广,影响甚大。《新论》通过翔实的证据,条分缕析,指出《教学通义》的性质是借助所谓周公教学之法的论说来表述自己的基本思想,是一部讲治术的政治学著作,与今文经学

观念相去甚远。其中康有为对经学一些问题的看法,与今文经学存在明确的不同,甚至是相反对的说法;而其中关于今文经学的观念,不过是康有为后来的增窜。而就《教学通义》的基本思想来说,并没有所谓今文经学观念。《新论》这些观点是通过认真考证得出的真知灼见,不仅具有正谬纠偏的作用,而且具有理论价值。类似的创新观点在本成果之中还有很多。

### 四

《新论》作者黄开国教授从事经学史研究30余年,治学严谨,学风朴实,成果极其丰硕,许多论著都是开创性的,卓然成一家之言,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。该成果言必有据,不发空论,立足于整个中国学术文化史的宏大视野,在全面准确把握中国经学史发展演变脉络的基础上,重视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,对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进行深入思考,认真研究,既有理论创新,又有历史考证,义理与考据相得益彰,既解决了不少经学史上的重大问题,又纠正了前人和时下流传的一些认识误区,从而将清代今文经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。

当然,任何研究成果都不是研究的终结,而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。一部好的著作可以创新某种研究范式,开拓未来的研究方向,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、方法,但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问题,必然会为后续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。《新论》无疑是一份优秀的学术专著,但同样也留下一些尚待继续拓展的话题。该书以清代著名今文经学家的研究为主,对一些次要经学家的论述略显不够,如对戴望、皮锡瑞的经学成就基本上没有涉及,这是一个遗憾。另外,在行文上略显重沓,若假以时日细致锤炼,可以更加简洁。有的章节为课题组成果,故各部分之间文风也有些差异,可以再整齐统一,则为上善。